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

移植、调适与发展

周谷平 张雁 孙秀玲 郭晨虹 著

未名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适与发展. / 周谷平等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308-10492-0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7023 号

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适与发展

周谷平 张 雁 孙秀玲 郭晨虹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42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492-0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冲突与融合 :理念的转型	(12)
第一节 中体西用的杂糅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理念	(13)
第二节 新气象 :理念的转型	(19)
第三节 融合与发展 :理念的调适	(36)
第二章 移植与调适 :模式的嬗变	(74)
第一节 西方近代大学模式概述	(75)
第二节 以欧美为蓝本 :学术模式的借鉴与创造	(79)
第三节 转型与发展 :教学模式的变革	(161)
第四节 变迁与拓展 :管理模式的转型	(190)
第三章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课程体系的演进	(206)
第一节 西方大学课程分科设置的传入	(206)
第二节 学科与社会的互动 :课程设置的改造	(215)
第三节 近代大学课程设置理念与特色	(257)
第四章 为民众谋福祉 :社会服务的拓展	(271)
第一节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	(271)

2 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适与发展

第二节	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社会服务·····	(312)
第三节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与本土大学社会服务之比较 ·····	(339)
结 语	·····	(354)
参考文献	·····	(356)
后 记	·····	(377)

导 论

大学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特机构,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曾做过一个统计,在 1520 年前全世界建立的组织中,现在仍然使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的只剩下 85 个,这 85 个中有 70 个就是大学,另外 15 个是宗教团体。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组织之一。

尽管中外高等教育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和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但因年代久远,学界一般把建于公元前 124 年的太学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而把中世纪大学看成是西方现代大学的起源。这两种极具特色的办学制度,对中外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中世纪大学被视为西方大学史的滥觞,但关于太学是否中国大学发展史上的开端,学界却一直存在争论。通过辨析太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办学特色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不但可以深化“中国古代是否有大学”这一问题的探索和争鸣,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大学的历史起源与发展逻辑,为当下在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如何建设中西融合、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大学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亦可为本书的整体论述奠定逻辑基础。

一、古代太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发端及在各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

经秦统一中国,推行“禁私学,以吏为师”与“皇权至上主义”的政策,至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本策略,中国就此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法制成为政治结构的根本特征。

汉初的官僚基本上来源于世袭、捐资及察举,这种人才选拔制度造成官僚结构的混乱和素质的低下。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①他不仅把太学看做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也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选拔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并批准丞相公孙弘提出的创立博士弟子员制度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于乡党,又以奖励贤材之人。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②为博士设置博士弟子员(即太学学生),是中央官学——太学正式成立的标志。

公孙弘为太学学生的待遇与入学资格制订了具体办法:“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得受业如弟子。”^③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定了太学的建立。

太学的学习内容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并要求“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④。太学学生学习一年,精通一经就可以入仕的规定,使得政府直接控制了受教育者的政治前途,并就此确立了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两千年不变的性质——培养国家后备官僚。太学成为官僚体系的附属机构,这种权力本位教育以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使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依附于政治的组织形式。

与太学相比,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内驱力是由欧洲社会的复兴、城市的发展、西方社会专门教育机构的缺失及“哥利亚德”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构成的。当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社会对大批专业人员的需求,同时教会也需要补充教职人员,这种特殊的国家与教会同时发展的社会模式,使得培养训练专业人员的教学机构得以兴起。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法律、医药、神学和文艺等都需要有能力的和受过

① 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② 程舜英编:《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③ 程舜英编:《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④ 程舜英编:《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学校教育的人,而大学这一机构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受过上述专业培训的人群,它的成果也是城市和教会所需要的。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使发端于 12 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成为具有行会性质的社团组织。行会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特有产物,10 世纪后欧洲的城市是一个独立的地域共同体,具有完善分工的各种行政机构,是在国家实际上尚不存在的环境中自发兴旺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市民拥有高度的自主意识,而行会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共同体。

universitas 一词的本意是指一个具有某种一体性的社团,它指各种行业——手工业工人、商人等的行会。它们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市场、决定职业标准以及寻找其他有利的事,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和自卫性的特点。据记载,当时大量的行会遍布各个城市,法兰克福有 137 个行会,纽伦堡有 96 个行会,巴黎有 101 个行会。中世纪晚期,学生和学者逐渐地发展为一个职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于是有了组成行会的需要。Universitas 也就成了大学的指称。大学是知识分子的城市与行会,是拥有文科以及一个更多从事法律、医学和神学课程的教学人员机构。

行会从其诞生之日起,既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同时也享有在此基础上的权力。它是自发产生的一种社会调适系统。由于大学早期等同于行会,所以它也就获得了各色行会都多少具备的特权和豁免,其中大学最主要的特权是法权自治、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及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大学以这些特权为基础构建了大学自治的组织特征并形成了学术自由的传统。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太学直接置于政府掌管之下,国家利用教育控制了学术的发展方向。太学成为后备官僚的养成之所,它的创办是以教化的推行与官僚的选拔为旨归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使得“读书做官”的世俗观念与“内圣外王”的理想主义紧密相连。“学而优则仕”成为世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导引下,权力本位教育自动地凌驾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上,凸显了

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作为具有行会特征的中世纪大学,是在“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归恺撒”的二元制衡机制下发展起来的。欧洲中世纪政教分离的传统,让大学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拥有了教学自由与自治的权力,为以后现代大学的形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结构资源和思想资源。中国古代太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各自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即后备官僚的养成之所与未来职业人员的学习场所,表明了这两种教育制度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

二、古代太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办学特色比较

考察古代太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办学特征,可以发现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主体的差异

教学主体反映了该教育制度的性质。太学的教学主体即博士与博士弟子,是享受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博士是掌管宗庙礼仪最高官员——太常的下属,负责太学的教学活动,博士属于中级官员,但其地位却优于其他同级官员甚至高级官员。《汉官仪》记载:“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①博士的俸禄“本四百石,宣帝增智”六百石,但却与二千石一级的官员享受同等待遇,而且博士升迁为公卿者的机会也比其他人多,如公孙弘、蔡仪、张禹、匡衡等博士都最终登上丞相的位置。由太常选送的博士弟子为正式生,享有官俸。

通过将博士与博士弟子纳入国家供养体系,太学被直接置于中央行政机构的管理之下,皇帝对师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博士们只对皇帝负责。太学的教师和学生接受统治者的俸禄,缺乏任何的经济独立,便只能作为统治阶级的依附体而存在,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是失效的。经济来源

^① 俞启定著:《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68页。

的单一性,导致受教育群体回报对象的单一。由于权力主体是教育投资的最终兑现者,他们需要的是维持现有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知识。因此,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守旧性和滞后性。

中世纪的每一所大学都是模仿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中的一个建立起来的。整个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大学一般以波伦亚大学为蓝本,学生们自己组成社团,他们雇用教师、支付教师薪水,如果教师玩忽职守或教学效果不佳,学生们可以予以罚款或解除其教职。欧洲北部的大学则以巴黎大学为样本,这类学校由教师组成社团。它包括四种教职人员:艺术、神学、法律和医学。每一种教职人员都设一名学监。在欧洲北部的绝大多数大学中,艺术和神学是研究的主要分支。大学具有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特征。教师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学生的动机则是追求知识及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与太学的经济来源由国家负责相比,中世纪大学的经济收入有三种渠道:一是依靠学生的学费;二是依靠教会的圣俸为生;三是依靠世俗权力机构发给的薪水。具体而言,“教师或者靠工资,或者靠领地的收益;学生或者靠助学金,或者靠教会薪俸。工资可以有两种形式:教师可以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酬金,或者从世俗权力机关方面得到报酬。助学金可以是私人赞助者的赠予,或是经由公共机构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提供的资助”^①。不同的经济来源背后有着不同的责任。但教师们的收入更多的还是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与学说,就像手工工匠出售自己的生产成品。

中世纪大学的教师与学生的经济来源受益于社会各个阶层,其责任对象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教会、国王、贵族、各色行会、甚至普通市民。一般来说,作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教会和国家向知识分子诉求的是一种能维持现状稳定的社会逻辑体系;而非既得利益者,更渴望有新的知识体系改变现状。而知识分子的这种经济处境,决定他必须同时

^① [法]勒戈夫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6页。

满足双方的要求,由此形成知识结构的稳定性与革新性的良性循环,促使社会稳定发展及文明的进步。此外,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仰仗于科学的进步,知识逐渐地演化为生产力的核心,更增进了大学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体阶层。

(二)教学内容的差异

太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籍为教学内容的官方高等教育的开始。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立“五经”博士。作为太学教师的博士都是精通一经的经师,并属于官方承认的经学学派。“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①“《书》、《礼》、《易》、《春秋》四经,各只一家;唯《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②由于传授途径和编定者的差异,在汉代就有了不同的儒经传本,代表不同研究者的学术思想,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但只有那些适合统治者政治要求的经学研究才得到政府的提倡并得以在太学传授。汉代太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极为重视师法和家法,要求学生以老师的学说为准绳。这固然体现了维持学术稳定和统一的需求,但这种做法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严重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和思想定于一尊,对后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太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推行教化,因此侧重于言志的《诗》的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涵养,更重要的是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可以引用《诗》文,发言立论,增强论说的效果。《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集,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春秋前期的史料,是用来借鉴治国之道的。因此,《书》的教学在太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礼》的内容是关于春秋前的旧礼仪,其中许多规定已不适用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实用性的降低使其地位逊色于其他经籍。但礼仪又是维护统治必不可少的程序,因此,也成

^① 程舜英编:《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② 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为太学的学习内容。《易》的核心内容是阴阳变化,用于指导言、动、制器和卜筮,可以让“圣人以断天下之疑”。《春秋》的目的在于“道往而知来者也”。太学生精通一经且通过考核后,就能步入仕途的规定,使得以书本知识为主的学习成为太学的最基本形式。

太学生们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以上述五种儒家经典著作作为主要学习内容。虽属分科教学,但却是建立在大一统儒家思想的架构之下,是一元化思想体系中的分支流派。教化的内容贯穿学习的整个过程,知识变成道德教化的代名词,在社会结构中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太学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并且也不授予学位,教学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之上。

中世纪大学是进行一般教堂学校无法从事的高级研究的机构,有文学艺术、法律、医学及神学等专业研究。开设规定的课程、实施正式的考试、雇用稳定的教学人员、颁发被认可的毕业文凭或学位是中世纪大学的独有特征。中世纪大学的课程表不包括历史或类似现在的社会科学那样的课程,学生进入大学后,要花四年时间研究基础文科,即学习拉丁文法和修辞学,掌握逻辑规则。如果通过考试可以获得学位。学士起初并不是正式学位,只是表示学生已经取得学位候选人的资格,后来才成为一种独立的低于硕士、博士水平的学位。这些学位起初并没有高低之别,只“意味着同一件事——教师”。后来,如果学生要获得硕士学位,通常要花三四年时间研究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通常还要阅读和评论标准的古典作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学位课程强调抽象分析,若要获得博士学位,则要接受更专门的训练。如在巴黎,罗伯特·冯·库尔森(Robert von Courson)章程规定,需要八个学年,并且至少要到35岁,才能获得神学博士学位。^①

神学课程体系的核心是围绕《圣经》的争论。当时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士或从事教士工作的候选人,他们聚在一处,进行关于理性与信仰

^① [法]勒戈夫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9页。

的论辩。这些教学活动进一步发展了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目的在于消除社会对上帝存在的合法性的怀疑。因此,课程设置以语法、修辞、逻辑的学习为主。学习内容分为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等。在文学艺术学院占主要地位的是逻辑学和辩证法,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目的,为进一步学习其他课程奠定基础。

此外,医学院与法学院的教学则集中于专业知识。12世纪以后,法律知识对行使教皇的职能变得重要,以至于大多数教皇都精通教会法。此时,教会与城市的发展,对训练有素的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训练未来的教士、律师、医生与城市官员显得尤为必不可少。

(三)教学方法的差异

太学教学方法以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学为主,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是重要的教学形式。但问难、讨论的内容是不能脱离儒家思想范围的。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使得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只注重对儒学经典的讲解与记诵,学生只需将各类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就有了进入官僚阶层的先决条件。专制思想与怀疑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国学术是在缺乏怀疑精神的社会背景下运作的,而怀疑是所有学术创新的原动力,因此中国数千年学术进展的缓慢也是必然的结局。同时,正因为逻辑思维是生长在怀疑的土壤上的,这种缺乏怀疑精神的学习方式使得太学的教师、学生的思维具有去逻辑性和非理性化。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讲授、背诵、辩论。在西方,逻辑成为正式的教育内容始于亚里士多德。古希腊逻辑学和古印度因明学在创始之初都怀着同样的目的,即建立一个学术辩论成败的标准形式,因此,它与辩证法是不可分离的。至中世纪,形式逻辑发展成一种庞大的认识论体系,在基督教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教会希望用形式逻辑解决社会对上帝的怀疑,把学习辩证法看成是通往上帝真理的门径,当时的显学——经院哲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勒戈夫认为“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

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这是本世纪(中世纪——笔者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进步”^①。因此,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教学在中世纪大学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从启蒙运动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传统形式逻辑所能证明的内容给予坚决的否定,但这种思维的形式却成为现代理性主义的摇篮,三段论依然是当今学术论著的重要形式。

通过上述中国古代太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太学和大学都是社会高端知识人的聚集地,因此,对东西方知识群体潜意识的关注,更有助于我们辨析这两类教育机构的本质区别。

一般学界将中国知识人自主性人格的缺失与皇权专制大一统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上述论述中,我们已从政治、经济层面探讨了这一思想意识的起因。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即中国士人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韦伯称之为“政治实用理性主义”,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即是所谓的“重行主义”。

从“朝闻道,夕死可矣”到“修、齐、治、平”的转变倾向,体现了知识人价值理念的转变。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远胜于对知识本身的兴趣,政治实用理性主义的泛滥,淡化了知识的形上意义。笛卡儿说:“全部知识就犹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②事实上知识的形上意义才是知识人的精神家园。而丧失这一精神家园的知识人有如失去田地的农民,委琐地徘徊在某个豪阔庄园的墙外,梦想着被雇为豪门的奴仆。因此,知识本体意义的缺失、政治专制主义及知识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失效这三个原因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知识人群体无主体性的人格特征。由这样的知识人组成的太学缺乏中世纪大学的表象与内在特征,即明确的课程表、固定的教学组织人员及学位颁发制度和教学自由、学术自治等伴随着大学而出现的特性。

① [法]勒戈夫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页。

② 转引自金惠敏著:《意志与超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尽管我们不能全然否定中国古代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知识人的存在,但这样一个阶层显然是不存在的。太学等古代教学机构虽然表面上有着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相似性,但中国古代国家利用教育控制了学术的发展方向,进入官僚阶层成为世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导引下,官本位教育凌驾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上,凸显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表达的是古代知识人的政治趣向,他们的政治抱负取代了学术抱负。这使得上述机构与西方意义上的大学成为截然不同的教育实体。因此,中国古代太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不可同日而语。尽管这两者都是教学机构,但事物表层的相似性不能说明其本质,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不可能产生在古代中国的土壤上。

西方大学是学术文化内在逻辑发展到特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大学有其产生、形成的本土渊源,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情况密切相关。中国近代大学却是一个舶来物。从古代高等教育机构转型为现代意义大学的历史使命,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启先河。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这样一种异质教育的尝试,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考察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是一个不断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建立起中国特色大学的历史。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围绕德国大学理念进行的系列改革与以美国大学理念和模式为范本建立的清华、南高—东大、南开等大学群体,西方大学印上了鲜明的烙印。它的理念、模式、课程与社会服务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及本土化实践历程中,对中国大学产生了至深且远的影响。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和影响也密不可分,西方大学的理论与实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成为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经出版了一批介绍性、评述性、研究性的文集和学术专著,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较多关注于西方大学教

育理论与思想本身的阐释与探讨,较少有对西方大学理念、模式、课程及社会服务思想传入中国的路径与影响的系统梳理和研究;较多着力于对西方大学单个层面内容在中国的传入与影响,较少有从整体层面研究西方大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影响。由此,为本研究留下了可供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索的空间。

本书试图描述和把握的是中国大学百年嬗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在的历史运动,也是一种明显地体现了社会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自为的历史运动。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大学在中国的影响无疑给中国大学教育注入了全新的元素。

本书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以西方大学的传入为主要研究视角,阐述了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历程与西方大学影响的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重点集中于两条线索:一是随着西方大学职能的不断拓展,理念、模式、课程及社会服务思想传入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国人的选择与接受;二是上述内容传入后,对中国大学从理论、实践和制度层面带来的实际影响及与中国国情的调适。通过对上述两条线索冲突、交织和融合的过程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考察,揭示本土化历程中中国大学的变迁与发展。

第一章 冲突与融合:理念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剧烈解体,伴随“船坚炮利”而涌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即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现状。“在前此数千年的中国社会虽不乏内部的或异族的战争摧残,朝代频繁更替,然其文化生命则赓续绵延不断,但进入 19 世纪,不仅民族、国家生存已成问题,就是民族文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①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威,思所以自湔拔;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内,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②由此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开始进行抨击,“中国之学,有益于世者绝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词为最切。古人文法微妙,不易测识,故必用功深者,乃望多有新得……然在今日,强邻棋置,国国以新学致治,吾国士人,但自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矣,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也”^③。士人们认为“中国千年之士俗,为词章、训诂、考据之空虚”,传统学术“锢天下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8 页。

②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4 页。

③ 吴汝纶:《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 1990 年版,第 97 页。

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结果是民穷而国弱。

国内学界对西学的认识逐渐加深,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特别是甲午一役后,让国人处于痛定思痛的反思中。将“蕞尔小国”战胜“泱泱大国”的原因归结为教育,中国朝野上下亦把症结归为教育。“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① 诸如“今者广开学校为最要矣”^②、“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③等认识汇为一股风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全国成为一股热潮。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府试图导入西方大学的尝试,也表明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大学教育在国家强盛中的作用。可它虽有大学之形却缺大学之实。所谓的“形”是指京师大学堂从日本间接移植了西方大学相关制度、导入相关教学内容,而“实”则事实上依然受传统理念的影响,没有摆脱旧式官僚养成所的实质。应该说中国近代大学理念的真正转型与蔡元培及其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密不可分。

第一节 中体西用的杂糅:晚清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理念

甲午战争前,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引起中国的关注。1877年起对日遣使。此外,清政府派遣不少官绅陆续以观光、游历、考察的名义赴日,他们从天文、地理、河渠、风俗、职官、政事、文学、艺文等方面对日本展开了百科全书式的考察,但在留下的记述文本中,关于教育考察的内容大多停留在资料的罗列和感性的层面。

对日本教育体系的全面考察始于甲午战争后。面对日益加深的内忧外患,朝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教育在日本崛起中的作用,以日本为媒介

①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②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③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